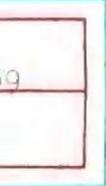


中国近代药学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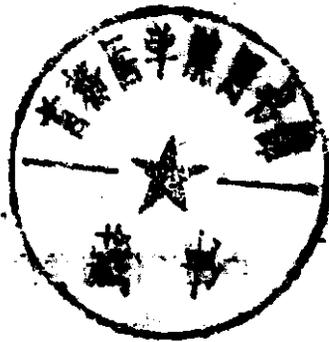
陈新谦 张天禄 编著 人民卫生出版社



1
R93-09
CXQ

Y4113/0P
中国近代药学史

陈新谦 张天禄 编著



A00497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京)新登字081号

中國近代醫學史

陈新謙 张天祿 编著

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崇文区天坛西里10号)
北京市卫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 9% 印张 254千字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1 560

ISBN 7-117-01641-8/R·1642 定价: 10.30元

〔科技新书目259—214〕

序

药史学是一门重要的学科，但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尚不多，出版的书籍也很少，目前仅能见到1984年出版的《中国药学史料》(薛愚等编著)和1987年出版的《中国药学史纲》(俞慎初编著)。

中国近代药学史是中国药学史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却是她的一个薄弱环节，过去研究的人更少，迄今尚无一本这方面的专门著作出版，是药史学中亟待填补的一个空白。

中国近代药学史是一部科学技术史，它反映了1840年以后百余年间，我国传统的中药业在内外反动势力重压之下为争生存而不断斗争的历史；也反映了我国近代的医药事业从无到有，几经曲折，挣扎前进的历史。整个近代药学史带有我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显明色彩。

经过近几年的辛勤发掘、耕耘，我们终于写成了这本书稿，总算作了一点填补空白的工作。

中国药学史的近代部分，不像古代部分那样，有许多本草文献以及有关研究论文可以作为工作的基础。多数史料都需要作者自己动手去发掘——从零散的书报期刊资料中，从学术会议的论文报告中，有时甚至是从一些老前辈的片段记忆中。虽然我们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搜集到的史料还是有限的，反映的历史面貌仍难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有待于今后的不断充实和提高。

本书正文之后收有三个附录，分别就近代药学大事、近代药学史参考文献资料和近代药学人物作了简要介绍。人物的收载范围以1915年为下限，生年在此以前的才予收载。

本书的第十二章至第十四章以及附录三，由张天禄撰写，其余由陈新谦执笔。最后全书的统纂工作由陈新谦完成。

本稿曾蒙人民卫生出版社约请赵朴初先生审阅，在此表示感谢。

限于作者水平，内容定有不少错谬欠妥之处，请读者不吝指正。

陈新谦 张天禄

1990年10月

前 言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我国古代文化宝库里，有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这就是祖国医药学。

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像葛洪、雷斅、陶弘景、孙思邈、苏敬、唐慎微、李时珍等等伟大的医药学家，曾产生过像《神农本草经》、《抱朴子》、《雷公炮炙论》、《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等重要的学术著作。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由政府颁行药典规范一类专书（唐代的《新修本草》、宋代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和最早设立国营医药商店及制药厂（宋代的“卖药所”及“医药和剂局”）的国家。炼丹术最先出现于我国，以后通过阿拉伯人传至欧洲，发展而成为近代医药化学。在药学领域，我国是一个有着优秀历史遗产的国家。

可是，我国由于长期封建制度的束缚，到了封建统治的末世即清朝中叶，医药学的发展同其他科学技术一样遭受到重重阻碍，当时政治腐败，经济停滞，思想统治实行高压政策，这些都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包括医药学在内）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另外，自雍正时起直到鸦片战争以前，清王朝顽固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使明末以来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几乎完全陷入停顿，前后达百余年之久。而这时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已经兴起，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应用达到空前的规模，它以很快的步子前进，把自诩为“天朝”、“中央之国”的中国远远抛到了后面。

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其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我国社会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一方面促使我国封建制度解体，产生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一个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通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侵略，又把一个独立的国家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还在

19世纪的下半叶,就开始有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投资于新式工业,但当时兴办的主要是纺织、缫丝、面粉等工业,还没有制药业出现。到了戊戌维新前后即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华商经营的西药房(如广州的泰安药房、上海的中西药房)以及制造家用成药的药厂(如广州的利济轩、梁培基药厂,上海的龙虎公司等)也开始出现。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即本世纪20年代前后,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经济侵略,我国的民族工商业包括医药商业及工业在内才得到了一些发展。

这是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发生变化的一个方面;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同时还有另一个方面:帝国主义勾结我国封建势力压制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帝国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控制了我国一切重要通商口岸,控制了我国的海关、对外贸易和交通,因此它们就能够把我国变成倾销其商品的市场。它们还在我国开办医院和医学校,吸收留学生,大量培养推销它们的商品——药品、医疗器械、卫生器材等的“义务推销员”,这样来为它们长期控制我国医药市场准备条件。

帝国主义列强还在我国经营了不少轻工业和重工业企业,其中也有制药企业,例如广州的屈臣氏药房,上海的施德之药厂、科发药厂等,对我国民族工业造成一定的压力,直接阻碍我制药事业的发展。

从1840年算起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止这百余年的一段历史,是外国侵略势力把我国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同时也是我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英勇斗争的历史。从药学史角度看,这一段历史也可以说是西方药学由国外传入,逐渐得到传播、吸收,终于在我国形成一个西药学(近代药学)的体系,并与传统的中药学体系形成相依并存的局面,共同为我国人民的医疗保健服务的历史。“温故知新”,温习这一段历史,对今后怎样更好地开拓我们的药学事业,是肯定能够得到一些借鉴和启发的。

目 录

第一章 鸦片(阿片)与鸦片战争	1
第一节 作为药品的阿片	1
第二节 作为毒品的鸦片	4
第三节 鸦片战争的引发及其恶劣后果	6
第二章 太平天国的药学事业	9
第一节 药材的供应管理	9
第二节 药材的使用	10
第三节 罗致医药人才	11
第四节 严禁鸦片	12
第三章 西方药学的传入	13
第一节 历代国外医药的传入	13
第二节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医药的大量传入和广泛传播 ..	17
一、建立诊所和医院	17
二、开办医药学校	19
三、派遣留学生	21
四、西药书籍的翻译和编撰	22
五、开设药行、药房、药厂	22
第四章 西药商业的兴起	25
第一节 概说	25
第二节 上海的西药商业	27
一、上海西药业的诞生	27
二、上海西药商业的发展	29
三、上海西药商业的经营特点	34
第三节 广州的西药商业	38
第四节 其他地方的西药商业	41
一、北京(北平)	41
二、湖北	42
三、开封	44

第五章 制药工业的诞生与发展	45
第一节 上海的制药工业	46
一、抗战以前	46
二、抗战期间	51
三、抗战胜利以后	52
第二节 广州的制药工业	54
第三节 其他城市的制药工业	56
一、北京	56
二、天津	57
第四节 抗战期间重庆一带的制药业	58
第六章 传统的中药业	62
第一节 鸦片战争以前的中药业	63
一、简要回顾	63
二、明清时期的中药业老字号	66
三、药材集市	68
四、对外药材贸易	70
第二节 鸦片战争后至民国时期的中药业	72
一、中外反动势力对中医中药的摧残及中药界的抗争	72
二、近代中药业的生产经营及集散市场	78
三、各地中药业概况	81
第七章 药学教育	101
第一节 高等药学（西药）教育	102
第二节 中初等药学（西药）教育	110
第三节 中药教育	111
第四节 教育规模及质量	113
第五节 “改院”斗争	114
第八章 药学研究	120
第一节 中药药理、化学等的研究	120
第二节 中药其他方面的研究	133
一、中药药性、鉴别、栽培、资源调查、制剂炮制、方剂等方面的研究及著述	133
二、中药文献的整理研究	134

第三节	药物合成、药品检验等方面的研究	135
第九章	药学团体——中国药学会	137
第一节	药学会的成立	137
第二节	历届年会	139
第三节	学术交流活动	144
第四节	期刊的出版	145
第五节	各地分会及其学术活动	146
第六节	药学会的其他活动	151
第十章	近代药学书刊的出版	153
第一节	本草及其他中药著作	154
一、	本草著作	154
二、	其他中药著作	158
第二节	西药书籍	161
一、	编译西方药学书籍	161
二、	自编药学书籍	165
第三节	药学期刊	169
一、	单纯药学期刊	169
二、	医药期刊	175
第十一章	近代的药品检验	179
第十二章	近代医院药房的发展	181
第一节	鸦片战争至 19 世纪末的医院药房	182
第二节	20 世纪初至解放前的医院药房	183
第十三章	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药学事业	186
第一节	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中药工作	186
第二节	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药品和器材生产	189
第三节	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医药供应及药材管理工作	192
第四节	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药学教育及科研工作	194
第十四章	少数民族药学简史及近代发展概况	197
第一节	藏族药学发展史	199
第二节	维族药学发展史	201
第三节	蒙古族药学发展史	202

第四节	彝族药学发展史	205
第五节	傣族和苗族药学发展史	206
第十五章	从近代药学史得到的启示	208
附录一	中国近代药学大事年表	220
附录二	中国近代药学史料简述	233
附录三	中国近代药学人物	249
汉语拼音索引	(人名、书刊名、机构组织、其他)	290

第一章 鸦片(阿片)与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清道光 20 年 (1840) 英国对我发动的一次侵略战争。战争的导火线是英国强行对我推销鸦片,它是 19 世纪以来外国资本主义强加于我国的一系列侵略战争中的第一次。清政府由于在这次战争中战败,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我国从此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与此同时,我国人民奋起反抗,从而揭开了我国近代史民族民主革命的帷幕。

鸦片又名阿片*。它本来不过是一种治病的药品(后来成为供人吸食的嗜好品),但居然能引起一场战争,甚至揭开了一个国家一段历史的序幕,这的确不是一件寻常的事,在整个人类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第一节 作为药品的阿片

阿片系取罂粟科植物罂粟 (*Papaver somniferum* L.) 蒴果的浆汁干燥而得。原产于小亚细亚,当地人很早就知道阿片的应用。

远在公元前 16 世纪,埃及草纸文对阿片已有记载。公元前 120~63 年,希腊国王 Mithridates 为防被人毒害,曾用数十种药物(其中包括阿片、胆汁等)配成解毒秘方,名为“Theriac”,即后来传入我国的“底野迦”。

公元一世纪,罗马学者 Celsus 所撰《百科全书》中曾记载阿片为止痛剂。药物学家 Diokorides(公元 40~90 年)在当时已完全熟悉阿片的制备方法,并推荐阿片用于安眠和止咳。他还记下了制备罂粟糖浆的方法。

阿拉伯著名医学家阿维森纳 (Avicenna, 980~1037) 在其名著《医典》中曾记下阿片的麻醉用途:吸入此药可使人入睡,服其糖浆可使痛觉完全消失,其栓剂亦有催眠作用。

* 习惯上“阿片”指供医疗用的药品,“鸦片”指供人吸食的毒品“大烟”。

至 16 世纪，阿片在欧洲已比较广泛地为人们所应用。瑞士化学家兼医师 Paracelsus(1493~1541) 非常重视阿片的应用，据说阿片酊就是他首先配成的。阿片的有名制剂复方樟脑酊，18 世纪初由化学家 LeMort 制成，开始时系用于治疗哮喘。阿片的另一制剂陀佛氏散 (Dover's powder)，因纪念英国医生 Thomas Dover 而得名，他在 18 世纪初叶曾应用此药治疗痛风。

直到 19 世纪，欧洲应用的阿片制剂还都是一些粗提取物。1803 年德国年轻的药师 Sertürner 从阿片中提炼出吗啡，并在自己身上作实验，险些送命。其后，陆续发现了阿片中的其他生物碱，如可待因 1832 年为 Robiquet 发现，罂粟碱 1848 年为 Merck 发现，等等^[1~4]。从此，一部分阿片粗提取物逐渐为纯生物碱所代替，但是，复方樟脑酊、陀佛氏散等至今仍为临床所用。

至于阿片之传入我国，则是从底野迦的输入开始的。

据《旧唐书》载：“拂菻国，一名大秦，……乾封二年，遣使献底也迦”^[5]。表明唐乾封 2 年即公元 667 年底野迦已传入我国。但实际上比这还要早，因为成书于 659 年的《新修本草》中已收载有底野迦了，表明至迟在此以前已传入我国。《新修本草》称：“底野迦味辛苦平，无毒。主百病中恶，客忤邪气，心腹积聚。出西戎”。其下并有注云：“云用诸胆作之，状如久坏丸药，赤黑色。胡人时将至此，亦甚弥贵，试用有效”^[6]。可见当时对其性味主治已有深切了解，并在临床上试用证明有效。

有人推测底野迦传入我国比上述时间还要早，可能在隋代以前就已传入我国，因《医方类聚》引《五藏论》云：“神方千卷，药方八百中，黄丸能差千病，底野迦善除万病”。按《五藏论》见录于《隋书·经籍志》，故推测底野迦在隋代以前即已传入我国^[7]。

阿片的原植物罂粟，据考证^[8]，传入我国也很早。唐开元 27 年 (739) 陈藏器《本草拾遗》中就有罂粟的记载，说明罂粟在公元 739 年以前就已传入我国。当时罂粟仅作花卉观赏用，如唐

太和年间（827~835）诗人雍陶有《咏米囊花》诗云：“万里客愁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米囊花就是罌粟的别名。

宋《开宝本草》（973）记载有罌子粟（即罌粟）。据《证类本草》引《本草图经》（1061）云：“罌子粟旧不著所出州土，今处处有之。人家园庭多蒔以为饰，花有红白二种，微腥气，其实作瓶子，……中有米，极细，……主行风气，驱逐邪热，治反胃胸中痰滞及丹石发动”^[9]。足见至迟 11 世纪，罌粟除药用外已相当普遍地栽种以供观赏了。

元代《回回药方》中载有罌粟子及阿夫荣，阿夫荣下并注明：“即是黑御米子熬的膏子……”。按“御米”为罌粟之别名，阿夫荣可能即阿片。

在明代《本草纲目》中，阿片系以“阿芙蓉”为正名而加以收载的，李时珍注曰：“阿芙蓉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云是罌粟花之津液也。罌粟结青苞时，午后以大针刺其外面青皮，勿损里面硬皮，或三五处，次早津出，以竹刀刮，收入瓷器，阴干用之，故今市售者犹有苞片在内”。说明当时阿片在市面已有商品出售。

至于阿芙蓉的应用，李时珍云：主治“泻痢脱肛不止，能涩丈夫精气。”“俗人房中术用之。京师售‘一粒金丹’，云通治百病”。关于“一粒金丹”，李时珍根据龚云林《古今医鉴》称：“真阿芙蓉一分，粳米饭捣作三丸，每服一丸，未效再进一丸，不可多服。”

除阿芙蓉外，《本草纲目》尚收载有罌子粟及底野迦。在罌子粟下，李时珍补充了罌粟壳的主治：“止泻痢，固脱肛，治遗精久咳，敛肺涩肠，止心腹筋骨诸痛。”并谓：“其壳入药甚多，而本草不载，乃知古人不用之也”^[10]。其实宋元祐年间（1086~1093），方勺《泊宅编》中已载有用罌粟壳治痢的医方，南宋张杲《医说》引其方云：“治痢以罌粟，古方未闻，今人所用，虽其法小异，而皆有奇功。或用数颗慢火炙黄为末，米饭下，或去粟用壳如上法，或以壳五七枚……焙干末，饮下，尤治禁口痢。”可见罌粟壳止痢的用法，在宋代已有记载^[8]。此外，李时珍以前的许多医家著作中，如《易简方》（南宋王硕撰，约刊于 12 世纪

末)、《黄帝素问宣明论方》(金·刘完素撰)、《医学启源》(金·张元素撰)、《儒门事亲》(金·张从正撰)、《世医得效方》(元·危亦林撰)、《本草衍义补遗》(元·朱震亨撰)、《本草发挥》(明·徐彦纯撰, 1384年刊行)、《普济方》(明·朱橚等编, 刊于15世纪初)等, 均对罂粟壳有所论述, 李时珍所说的“本草不载, 乃知古人不用之也”, 不能不说是失查。

《本草纲目》沿袭《新修本草》及《证类本草》将底野迦列入兽部, 想系根据《新修本草》注“云用诸胆作之”一语, 而不知底野迦实即阿芙蓉之制剂, 固可列入兽部, 但附于阿芙蓉之后则更为适宜。

由上可见, 从隋唐至明代, 阿片一直只供药用, 因此阿片进口是作为药品进口的。如明万历十七年(1589), 进口药用商品中即有阿片以及没药、乳香、阿魏等, 均课以相当的关税。万历四十三年(1615)、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和雍正十一年(1733)所制订的税则中, 皆包括有阿片。据许乃济在清道光十六年(1836)给道光帝旻宁的奏折中说:“查鸦片……乾隆以前, 海关则列入药材项下, 每百斤税银三两”^[11]。说明乾隆以前阿片都是作为药品进口的, 其量尚不大。

第二节 作为毒品的鸦片

至于国人何时开始服用鸦片成瘾尚待考查。据明·李梴《医学入门》(刊于1575年): 鸦片传入中国, “成化时(1465~1487)中国得其取汁之法。嘉靖初(1522~1526)其法益精。”不过, 《本草纲目》中并无服鸦片成瘾的记载, 故初步推测国人开始服鸦片成瘾至早当在万历或万历朝以后。虽据传明神宗朱翊钧(万历皇帝)曾因服鸦片成瘾(当时宫中称鸦片为“福寿膏”), 不过那时服鸦片成瘾的人毕竟是非常少的。至清雍正、乾隆年间此风始盛, 而且其时抽吸鸦片烟的新方法已从台湾传入我国大陆^[8]。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1765)于鸦片烟条下曾详细记载吸食鸦片之法, 并论及其毒害: “土人服此, ……肢体萎缩, 脏腑溃出, 不杀身不止。……常有身被逮系, 犹求缓须臾, 再吸一筒者。”

“迨服久偶辍，则困惫欲死，卒至破家丧身。凡吸者，面黑肩耸，两眼泪流，肠脱不收而死”。

鉴于鸦片为祸日烈，雍正7年（1729）清政府下令禁烟，开始时只禁止贩卖和私开烟馆招人吸食。及嘉庆元年（1796）因嗜者日众，始禁止鸦片进口^[8]。清政府虽严禁鸦片，对犯禁者科以重刑，但吸食之风不惟不减，反有日益加剧之势。黄爵滋《烟海纪闻》云：“嘉庆以来，犹征丰裕，士大夫家以及巨商大贾，奢靡成习，……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士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12]。许乃济更指出：“嘉庆初，食鸦片者罪止枷杖，今递加至徒、流、绞、监候各重典，而食者愈众，几遍天下”^[11]。为什么会愈严禁而食者愈多？这主要由于执法者本身往往即是烟犯，或藉禁烟以求中饱，这在林则徐道光十六年（1838）的一道奏折中说得非常清楚：“盖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贩卖之人，若不从此严起，彼正欲卖烟者为之源源接济，安肯破获以断来路？是以开馆应拟绞罪，律例早有明条，而历年未闻绞过一人，办过一案，几使例同虚设，其为包庇可知”^[13]。

当时在清朝官吏中还有一派人鼓吹“弛禁论”，许乃济即为其代表，他在奏折中写道：“闽、广、浙东、云南向有栽种罂粟、制造鸦片者，叠经科道各官奏请严禁，内地遂无人敢种，夷人益得居奇，而利藪全归外洋矣。其实中原土性和平，所制价廉力薄，食之不甚伤人，上瘾者易于断绝。……今若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则烟性平淡，既无大害，且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11]。这样的谬论自然不会不影响禁烟政令的贯彻执行。

另一方面，在禁止鸦片进口上也遇到很大困难。英国不法商人为了牟取暴利，公然采用贿赂清廷官吏、武装保护偷运*等卑鄙手段，向我国大量运进鸦片，因此愈禁而进口愈多。乾隆三十二年（1767）以前，每年鸦片进口不过二百箱，至道光四年（1824）

* 据许乃济奏折：“有来往护艇，……炮械毕具，亡命数十辈，运柴如飞，所过关卡，均有重贿，遇兵役巡船向捕，辄敢抗拒，互致杀伤”^[11]。

已达一万二千余箱，及至道光十七年(1837)竟达三万九千箱⁽¹⁴⁾。

第三节 鸦片战争的引发及其恶劣后果

鸦片汹涌而入，使我国人民受到严重的毒害，也造成了白银的大量外流，加深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清政府为了其自身统治利益并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严令禁烟。道光十八年(1838)12月，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去广东查禁鸦片。次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于是年6月在广州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从英国不法商人等手中缴获的鸦片200余万斤。英国政府闻讯后立即发出狂热的战争叫嚣，积极策划一场侵略战争。1840年6月，英国军舰侵入我广东海面，封锁珠江口，于是挑起了鸦片战争。由于清廷腐败无能，战争失利，被迫于1842年8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大门已被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鸦片更加如洪水猛兽，汹涌而入，烟毒泛滥于全国。

外商除贩运鸦片外，还制售所谓“戒烟药”，通过大做广告，来骗取中国人的钱。上海《申报》创办后不久刊登的第一则药品广告，就是英商老德记药房的“包戒烟断瘾药”的广告。这些“戒烟药”究竟有无效验？清著名医家王士雄曾指出：“断瘾之方，验者甚少，且用烟或烟灰者居多。似乎烟可少吸，一不服药，瘾即如故”⁽¹⁵⁾。有人且指出：洋商制售戒烟药不啻乘机贩毒，其罪恶不在贩卖鸦片以下。

当时国内还有一些医生出于治病救人的好心，孜孜钻研戒烟方药，何其伟即其中之一。何其伟字书田，出身医学世家，与林则徐为至交，曾撰《东南利害策》一书，举出十三条治国安邦的办法，林则徐采纳了九条，其中一条就是禁戒鸦片。何并研究出戒烟药方“救迷良方”，林则徐所到之处，均要求所有药铺制作此戒烟药，群众因称此药为“林十八”（十八味药配成）或“林文忠公戒烟丸”。当时林则徐还将《救迷良方》的小册子在南方各省刊行传播⁽¹⁶⁾。

在鸦片战争以后不久建立的太平天国，对吸食鸦片是严加禁